

# 论共青团改革的首要问题和基本前提

■ 张 华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北京 100005)

**【摘要】**“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在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中长期存在,导致团组织尽职履责的能力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的发挥。在共青团改革中,要特别警惕“行政化”的影响,同时要从战略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挖掘其存在的根源,直击要害。共青团改革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突出和强调政党青年组织的性质本原,始终坚持党的青年组织的基本属性不动摇,切实保持和增强共青团自身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关键词】** 共青团 群团改革 组织变革 去“行政化”

通常来看,由于外部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自身出现不适,导致预设的组织目标无法实现时,组织变革就成为获取力量并继续前行的重要选择。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当然不能违背这种基本逻辑。因此,对共青团改革的观察应该从组织建设的原点出发,坚持问题导向,透过历史变迁的窗口,寻找组织功能异化的核心及诱因,纠偏矫正,正本清源,梳理出清晰的逻辑,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广泛的思想认同基础,从而使共青团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 一、改革背景与重点

任何组织的改革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也都有清晰的问题及表现。例如,1936 年 11 月,出于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和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类似的重大变革并非绝无仅有,也非历史的偶然。在共青团的发展历史上,革命性的变革不止一次,更名、改造、试建、重建等重大变革曾经先后出现。尽管个中原委不尽相同,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只有变革才能保障组织职能得以充分履行,只有变革才能保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 1. 问题的集中表现

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形势的不断发展,关于共青团调整、改革、创新的呼声不绝于耳,已然成为改革开放后共青团建设的核心话题。特别是近年来,团的工作对象“高端化”、工作方

收稿日期:2016-09-18

作者简介:张 华,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团建理论与青年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国家财政专项课题“共青团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研究”(课题编号:ZD2016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式“行政化”、作品内容“娱乐化”、工作载体“格式化”的现象日益凸显，逐步导致了团员的政治意识、先进意识和模范意识有所减弱，团员对普通青年的影响和带动有所减弱，共青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所减弱。这些现象的不断蔓延，影响和制约了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sup>[1]</sup>。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远离青年现象的普遍存在，直接导致团组织尽职履责的能力降低，长此以往，势必会对党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

在党的青年群众工作范畴中，上述种种现象理应受到排斥，其普遍存在无疑表明，团的组织行为在具体实践中发生了异化。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又不仅仅存在于共青团，几乎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无一例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饱受诟病，被高度概括为群众团体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并受到严厉批评。事实上，由于反对和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是群团组织改革的共同目标，所以从总体上看，这种批评虽然尖锐，但对共青团而言，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具体剖析，也不会有如芒在背的反应，更难以生出足够的改革动力。

“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sup>[2]</sup>问题导向的核心要求是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现象绝不会凭空产生，更不会孤立存在。肯定了这个认识，就能够不为现象所困惑。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sup>[3]</sup>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团的历史充分证明，要保证党的要求和青年的呼声得到有效落实，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始终坚持“既反对把青年团变成狭隘的青年组织，也反对把青年团降为一般性的群众团体”的基本要求<sup>[4]</sup>。共青团的这种特殊性是与生俱来的，在根本上取决于党的要求。在党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共青团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共青团不仅要做好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而且还要发挥作为各种青年组织和青年社团的核心组织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或领导）和管理，而应该是政治上的规范和引导<sup>[5]</sup>。如此看来，一切“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方式都无法完成共青团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也显然不是共青团的理性选择。

## 2. 重点所在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各有侧重，含义不同，对团的建设的实际影响和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其中，“行政化”是个根本，或决定、或孳生、或助长了其他三个方面。行政是政府组织管理国家事务的特定功能。所谓“行政化”，多用来批评非行政机构运用行政管理手段的具体现象。近年来，共青团的行政色彩浓厚，青年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中充斥着行政思维和大量的行政管理方法，特别是在所谓承接政府青年事务的口号下，模糊了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性质，把政治任务变为技术工作，严重背离了共青团的性质和宗旨。“行政化”倾向本身是个悖论，却能够大行其道，更令人深思。

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烙印”。虽几经改革，但都没有彻底打破行政化的格局，没有与共青团的职能配套<sup>[6]</sup>。尽管“行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历次共青团改革也都提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1987年发表的《共青团行政化工作方法批判》一文指出，为了克服团组织承受能力与工作期望值之间的矛盾，一些团组织试图借助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团内指挥系统的权威性，以保证团内各项工作的开展和活动的实施<sup>[7]</sup>。似乎“行政化”是为了解决实际困难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作为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是历史的产物,绝非孤立的社会存在。在历史环境中观察共青团的发展与变化,有助于通过现象还原事物的本质,并从中增强对共青团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际上,“行政化”不是单纯受主观驱使所形成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发展逻辑。20世纪90年代,宋德福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共青团组织在体制上存在弊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团的领导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化倾向,不能很好地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青年<sup>[8]</sup>。由此可见,“行政化”现象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其原因十分复杂,是共青团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顽疾。

## 二、“行政化”的历史成因

假如詹姆斯·R·汤森做出结论:中国共产主义要么是本国的创造性的产物,要么就是一种外国学说在中国的应用,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它实际上是两者的混合,其起源是外国的,但中国人在进行了长时期的处理之后,以充分的独立性使之成了自己的东西<sup>[9]</sup>。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正确解读,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观察和分析共青团的改革,情况也是如此。

### 1. 无法跨越的政策学习

通常来看,出于“解决难题”的需要,在公共政策方面展开国家间的学习与借鉴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共青团是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列宁世界革命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苏联列宁共青团是一个团结广大的苏维埃青年阶层的群众性非党组织,紧跟联共(布)党,是它的后备军和助手<sup>[10]</sup>。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显然严格遵循了这种政治逻辑。之后,这种政治规定性不仅在1946年团的试建过程中得到延续,而且还完整地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设之中。

苏联对中国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共自身的组织。它表现在1949年以后产生的国家结构和行政实践中,出现于“转换带”结构和非党组织(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妇女组织)的职能中,以及中共对所有其他机构的内在指导关系之中<sup>[11]</sup>。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开始的国家管理以及经济社会建设,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毫无经验可谈,争取苏联的支持十分紧迫和重要。为解决新生政权将要面对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一场大规模的政策学习和政策转移在中苏之间全面展开,开启了“苏联模式”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序幕。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学习治国理政经验。7月6日,刘少奇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开列了一份六百多字的学习清单,主要涉及国家结构、经济政策及管理、文化和教育、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等四个方面,得到了苏联的积极响应。而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中,刘少奇希望了解苏联党组织的形式、党的工作范围、党的教育组织、党委会的体制、党的干部管理、工会组织形式、青年组织形式等。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全面学习苏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基本要求是:要善于向苏联学习,并且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这样,学习苏联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意义,其早已超出“解决难题”的理性需要。

### 2. 经验转移中的“迷失”

今天来看,建国之初的学习苏联既包括“工具学习”,也包括“社会学习”,对于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巨大帮助。比如,通过学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成就——共青城,共青团领导团员青年建立了“共青农场”、“共青城”等直接参与生产实践的重要组织依托。在列宁思想中,共青团是党的青年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然而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社会团体开始出现“行政化”倾向,30年代初改组后的社会团体,不仅仅是带有行政化倾向,而是普遍行政

化了<sup>[12]</sup>。包括共青团在内,社会团体迅速“行政化”,并仿照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确定了机构设置、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官气十足,俨然成了国家行政机构。由于“行政化”的影响,社会团体脱离了群众,不接地气并变成狭隘的“机关”,工作视野收缩,随即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现象。当时这种情况的蔓延十分广泛和严重。比如,苏联作家协会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化、官僚化、国家化变得最为严重<sup>[13]</sup>。作协况且如此,共青团就更加难以独善其身了。赫鲁晓夫执政后,苏共关于社会团体的理论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但“行政化”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认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向苏联全面学习的重要前提。苏联经验被广泛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当看到,由于这种政策学习远远超出了“解决难题”的初衷,许多方面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模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团体的“行政化”也随之一并移植过来。由此可见,越来越严重的群众团体“行政化”倾向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今天所说的共青团“行政化”有着特殊的国际背景。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成立之初就已处于“行政化”的思维之中,并行驶在惯性轨道上。比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团的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朱德就曾强调,“共青团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搞的,这就叫正规化”。不仅如此,“行政化”有着极强的惯性,十分顽固。改革开放之后,“行政化”屡屡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群众团体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sup>[14]</sup>。但政治体制下的高度集权,客观上始终助长着共青团“行政化”的发展。尽管苏联已不复存在,但“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未消失,“行政化”已然成为共青团的必然选择。

### 三、回归共青团的本原

《党章》对“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论述是共青团一切改革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遵循,偏离了这个前提,共青团就失去了组织价值。共青团的发展历史尤其是那些事关生存的经验教训深刻表明,共青团的改革绝不能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绝不能忽视先进青年的示范作用;绝不能脱离广大青年群众的支持。换句话讲,共青团的建设和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青年组织的基本属性不改变、不动摇。当下,共青团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特别是根除“行政化”的影响,根本目的就是要突出和强调政党青年组织的性质本原,回归党的青年组织的制度设计。

#### 1. 增强政治性

通常来看,政党青年组织是政党培养后备力量的重要依托,共青团也是如此。早在1927年,任弼时就曾尖锐批评CY替党做技术工作,一切对外活动都由党员负责的观念。他认为,这是取消主义和投机主义的错误,充分暴露出没有领悟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组织、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组织的政治意义。鉴于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任弼时还进一步明确警告说:“因为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sup>[15]</sup>

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而“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定位,赋予了共青团独特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使命,是共青团区别于其他群众组织的政治分水岭。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光荣使命,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是共青团工作特有的党性原则。共青团组织必须具

有鲜明的党性,这种党性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政治界定。在党团关系问题上,永远不变的是党,共产党是领袖,党领导一切,是一切问题根本的根本,这个道理要永远讲,直到党团消亡的时候为止。从共青团的历史实践来看,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作为生命线,是共青团履行职能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党对共青团的政治规定和政治鞭策始终要求共青团必须保持“纯洁的政治灵魂”,其核心就是团要始终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一直是党对共青团的特殊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建之初,党就告诫,青年团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允许成为党的对立者和妨碍者<sup>[16]</sup>。为了保持这种纯洁,党还在政治生活中做出专门规定。比如,团员一般不得参加民主党派<sup>[17]</sup>。1983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协商,各民主党派“不在共青团员中发展成员”。之后,又分别于1986年和1996年召集各民主党派对此予以确认。“团是党的助手,在确立政治积极性和成员的纯洁性方面仅次于党。”<sup>[18]</sup>大量的政治实践早已表明,政治性最终决定着共青团的生死存亡,不容选择。

## 2. 坚持先进性

“青年团员要在自己的不同岗位上积极地参加祖国的各种建设,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中国青年群众中起带头的和模范的作用。”<sup>[19]</sup>把先进青年组织起来,是共青团发挥作用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注重发挥团员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泛泛地组织一般青年,正是共青团先进性的根本所在。1947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重新建团时,要谨慎,要以队伍纯洁为主,注意维护团的先进性。1949年党中央通过的《建团决议》指出,把400万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先进的青年组织。“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sup>[20]</sup>,这是重建共青团的政治价值所在。

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青救会”的作用和缺陷等情况,党对共青团提出了组织青年的政治要求,由此确立和形成了以发挥团员作用为核心,并通过团员的先进性影响带动广大普通青年发挥作用的党的青年工作运行模式。与此同时,与党的特殊政治关系决定了共青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的组织风格,即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纪律、严肃的组织生活。而这也恰恰符合政党青年组织建设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

共青团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同工人运动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sup>[21]</sup>。1949年10月周恩来郑重建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团体资格参加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并起领导作用。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团的三大代表时也明确指出,团要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共青团的组织价值还表现为,在青联中的核心作用、对学联的指导作用、对少先队的领导作用。因此,对近年来关于共青团应借用西方理论并“由社会市场决定”的观点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有意识地将共青团等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并在实际行动上推动这一变化”<sup>[22]</sup>,从而丧失共青团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当明确,共青团的改革和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巩固共青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带动一般青年的示范作用。

## 3. 突出群众性

胡锦涛强调,共青团“在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都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sup>[23]</sup>。在现实生活中,共青团的确与众不同。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本质上是“很靠近党的”群众组织,因此必须具备群众组织的一般特征,集中起来就是群众性,但群众性不是仅仅反映青年群众的一般水平。共青团是党开展青年群众工作的助手,必须按照党的要求,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

时,还要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促进青年发展,带领青年前进。

事实上,由于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的特殊要求,如何走进一般青年群体、反映普通青年诉求,始终是共青团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如此,群众性同样也反映在国际青年运动中。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就认为,共青团的发展与一般青年密不可分,与青年保持联系至关重要,是少年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在先进青年之外如何团结更为广泛的青年群众,在团的重建过程中受到高度重视,并被鲜明地提出。“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sup>[24]</sup>

具体到共青团来讲,群众性还表现为青年性。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共青团不能搞关门主义,“画地为牢”。认识不到青年性对共青团的极端重要作用,就丧失了团的青年基础,其政治性、先进性也就得不到真正体现。历史上团的“第二党”倾向,严重影响了团的群众性,以致形成关门主义,无法有效代表青年。正是鉴于共青团在历史上的教训,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sup>[25]</sup>落实到实践中,共青团的群众性就是要在组织先进青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青年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从而更好地实现政治性、先进性要求,而绝不能抛开政治性、先进性,孤立地看待群众性。

#### 四、改革的基本路径

毫无疑问,当前共青团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力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按照党的要求,遵循科学规律,切实加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建设。

##### 1. 认知逻辑:增强组织认同感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句话,不怕共青团不跟党走,就怕青年不跟共青团走<sup>[26]</sup>。团跟党走取决于团的性质,是政治性的驱动使然,除此别无选择。然而,团跟党走,解决的只是青年中先进分子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般青年的问题并未随之解决。特别是在“精英化”“高端化”“小众化”等各种倾向泛滥,以及团的岗位成为一些人职务升迁“跳板”的情况下,个别团组织从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异化为团干部特别是少数团干部的精英组织,共青团和团员之间产生了距离感,一般青年更是敬而远之,甚至是望而生畏,党的青年工作受到极大影响。要改变这种局面,最重要的是要切实增强共青团的组织认同感。通过先进分子的吸引和凝聚,实现对一般青年的团结与引领,只有如此,共青团才能完成政治使命,实现政治性、先进性的终极价值。做人的工作,并在精神层面达到一个高位境界,远非政治想象力所能解决。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是青年参与的重要渠道。增强对共青团的组织认同感,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组织认同感涉及多种因素和多个方面,固然与组织能否满足人的各种现实需要密不可分,但政党的青年组织普遍认为,一个组织的理念是吸引青年的重要条件,政治性青年组织尤其应该坚持鲜明的政治信仰<sup>[27]</sup>。因此,无论是组织内部调整,还是各种流程再造,强化政治信仰,恪守政治性,始终在增强共青团的组织认同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共青团建设和改革永远不变的灵魂。

##### 2. 行为逻辑:保持团员先进性

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行为能力直接影响着团组织的活力,是增强团组织活力的“源头工程”。发展团员、壮大团员队伍是共青团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在团员队伍建设中,必须坚持团员质量第一,数量服从质量的要求。对此,党内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另一个极端是组织全体青年,而不要核心组织,没有骨干。结果什么人都参加了,等于什么人都没有组织”<sup>[28]</sup>。由于受

苏联“全民党”的影响，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影响和困扰着团的建设和发展。保持团员先进性是个重大的政治命题，也是共青团的重要政治法则。团员的先进性，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为团员与青年的比例。要审慎处理团青比例问题，保证团员数量对团的活力的支持处于最优状态。同时，要认真研究团员队伍的结构，重点解决团青比例过高和比例过低的失衡性分布，全面衡量和把握团青比例与先进性、战斗力的内在关系，不断提高团员队伍的模范带动作用。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简单扩大组织覆盖前提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再不能从“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惯性出发，在团员发展工作中层层加码，降低团员标准。应当明确，保持团员先进性，就是要严把“入口关”，坚决舍弃任何没有数量的质量和没有质量的数量。只有保持团员先进性，密切联系青年才能落到实处，共青团的群众性才能得到不断增强。

### 3. 动力逻辑：发扬团内民主

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是团的一切活动的主体。团员是个政治概念，和党员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骨干作用。从1955年毛泽东关于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作用的指示，到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再到1998年抗洪救灾斗争中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高度肯定，无不充分表明，团组织的活力首先来自团员而不是普通青年。团组织拥有高素质的团员，并不必然意味着团组织一定充满活力。充分发扬团内民主是激发团员活力的重要前提。发扬团内民主是共青团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发扬团内民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团员讲话，自由而充分地发表意见，从而使团员和团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有效发挥。共青团的建设和改革必须要把坚持尊重团员主体地位、保障团员民主权利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真正激发团员积极参与团内事务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发扬团内民主，要紧紧抓住团务公开这个前提，并将其作为团组织建设的一项基本制度。推进团内民主建设，要抓住团代会制度这个重点，不断改进和完善团代会制度建设，构建团内民主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长效机制。此外，要把确保团员的选举权作为衡量团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着力完善和改革团内选举制度。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废止委派制”，把权利从评委手中还给团员，切实保证充分体现团员意愿，回归团内民主选举的真谛。

### 4. 制度逻辑：坚持“团要管团”

历史清楚地昭示，“团要管团”是共青团自身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永恒法则，“团要管团”关系到团的生死存亡。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严肃的组织生活。“团要管团”就是要根据团的章程，按照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团的组织制度，全面加强团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团组织自觉接受党的统一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真正形成并建立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坚强队伍。实际上，“团要管团”是党的“党要管党”精神的具体落实与体现，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团、怎样建设团”的机制保障。“团要管团”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到今天的共青团改革，“团要管团”就是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团建理论的基础上，坚定政治方向，严肃政治纪律，以团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发挥骨干核心作用；以团员为主体，切实加强团员意识教育，以先进性带动一般青年；以广大青年为目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独立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竭诚服务青年。同时，要严格界定组织边界和工作边界，坚决摒弃“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思维下的简单扩大组织覆盖和为青年“设计”需求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要认真借鉴共青团早期以“团组”为核心领导和覆盖一般青年的政治智慧，着力解决组织松散瘫痪和脱离青年群众的问题。

**结语：**不同于以往，“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已成为社会议论共青团这场改革的标签式描述。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以及“官本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源于经验移植的“行政化”不断获得继续膨胀的土壤。由于团内“任命制”、“委派制”盛行，团员主体地位下降，团内民主停滞不前，形成了官气十足、远离青年、自我设计、自娱自乐的局面，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的发挥受到削弱。在这场改革中，面对“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现状，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简单地做一些碎片化的外科处理，也不能主观臆断、自圆其说，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最终迷失方向。

任何成熟的组织，都不排斥、不惧怕变革，而恰恰把变革作为组织建设发展的重大契机。在团的建设中，“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始终是个基本遵循。但不能用三分法机械地看待和处理。力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状，就是要回归党的青年工作的制度设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和艰难险阻，全面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完成党赋予的神圣使命的具体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组织价值，更好地发挥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只有这样，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 [ 参 考 文 献 ]

- [1] 张 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职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 页。
- [2]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5 页。
- [3] 《列宁全集》（第 2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4 页。
- [4] 胡耀邦：《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载《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4 日。
- [5] 田 杰：《回顾与展望：中国青年运动 80 年》，载《中国青年研究》，2002 年第 2 期。
- [6] 赵冰毅：《试谈共青团的机构改革》，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8 年第 6 期。
- [7] 王俊杰：《共青团行政化工作方法批判》，载《当代青年研究》，1987 年第 1 期。
- [8] 宋德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载《中国青年报》，1988 年 5 月 4 日。
- [9] [11] [18] 詹姆斯·R·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 速 董 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49、189 页。
- [10] 《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水 夫译，北京：时代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3 页。
- [12] [13]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4、275 页。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 页。
- [15] [20]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403 页。
- [16] [25]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4333/124349/17698698.html>
- [17]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工作编年记事（1949.10—1994.1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4 页。
- [19]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5 页。
- [21] B·B·扎格拉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刘庚岑 李兴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9 页。
- [22] 郑长忠 袁 罡：《社会转型期共青团职能定位与实现途径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23] 胡锦涛：《全面加强团的建设，更好地带领亿万青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成才》，<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4333/124349/1772306.html>
- [24]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6 页。
- [26] 甘 霖：《共青团作风建设新论——从一句团内流行语谈起》，载《中国青年研究》，2002 年第 3 期。
- [27] 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8 页。
- [28] 何启君：《青年团的初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7 页。

（责任编辑：邢 哲）